

「目录」

代序：“热”与主动创造	何兆武	1
第一章 沟通东西的媒介		1
一、输入欧洲的中国商品		1
二、东来的欧洲传教士		7
三、旅欧中国人		14
第二章 传教士与中国文化的西传		29
一、沟通中西的桥梁		29
二、“礼仪之争”		40
三、传教士与欧洲学者		48
第三章 欧洲“中国热”盛况		59
一、记述中国的著作		59
二、中国古代经籍的西译		83
三、“中国热”面面观		89
四、中国在 18 世纪欧洲的形象		126
第四章 中国文化与欧洲思想		153
一、欧洲思想家对中国文化的赞颂		153
二、欧洲思想家对中国文化的批判		179
三、中国文化对欧洲思想的影响		201
第五章 “中国热”降温及其原因		215
一、在华传教事业衰落		217
二、公众的兴趣转移		219
三、中国形象改变		222
四、欧洲思潮发展		226
五、无知与偏见		235
结束语：“中国神话”论辨析		239
参考文献		251
再版后记		271

Contents

Preface

by He Zhaowu

Chapter One Links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1. Chinese goods in Europe 1
2. Europeans in China 1
3. Chinese people in Europe 1

Chapter Two Missionaries and the Transmission of Chinese Culture to Europe

1. European missionaries in China 1
2. The Chinese Rites Controversy 1
3. Missionaries and European philosophers 1

Chapter Three A Spectacle of the Chinese Vogue in Europe

1. Works relating to China 1
2. 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s into European languages 1
3. Features of the Chinese Vogue in Europe 1
4. The image of China in eighteenth century's Europe 1

Chapter Four Chinese Culture and European Thought

1. European thinkers' praise of Chinese culture 1
2. European thinkers' criticism of Chinese culture 1
3. Influences of the Chinese culture upon European thought 1

Chapter Five Decline of the Chinese Vogue in Europe and Its Causes

1. The decay of the missionary work in China 1
2. The shift of public interests 1
3. The modification of the Chinese image 1
4. The development of European thought 1
5. Ignorance and prejudice 1

Conclusion An Analysis of the So-called Myth of China

Bibliography 1

Postscript 1

「热」与主动创造*

何兆武

不同民族的思想与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影响从来都是相互的，而不是也不可能是单方面的。闻道固然有先后，但是教学相长，“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古人即已明白此理。思想文化的影响最初是通过少数人之手，但逐渐成为风气之后，则其影响所及就不只是限于社会上的某一个小圈子了。就中西文化交流的研究领域而论，长期以来研究者们每多习惯于把眼光紧紧盯在少数几个传教士的身上，致使自己的堂庑也被局限得和那批传教士的落后的世界观同其狭隘，把自己的思想高度也自缚于那些传教士的陈腐的视野之内。这应该说是我们学术界一种可悲的现象。最近拜读许明龙先生新著《欧洲十八世纪“中国热”》一书后，使自己感到耳目为之一新，欣然感受到我国的研究者也有了自己高水平的严肃的学术成果，从而一洗徒以万千字数的假冒伪劣

* 原文题为《“热”与主动创造——读许明龙〈欧洲十八世纪“中国热”〉》，载《博览群书》2000年9期。

产品相炫耀，盗名欺世，从而使学术殿堂因之蒙羞的那种沉重感。作者是以自己严肃的工作在冲刷着、涤荡着学术界的浊流的。

明末清初的西方来华传教士黄缘时会，只不过是文化交流最初的媒介者，并且还是极其蹩脚的媒介者。把这批人当作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无异于相信圣诞老人真的会送礼物来。近代文化的新传统与中世纪文化的旧传统各有其不同的精神和面貌。近代科学的经典体系在西方奠定于17世纪，但在中国则要等到19世纪下半叶才被中国的科学家介绍进来并得以确立。生产力毕竟是最积极、最活泼、最主动的因素，而科学又是第一生产力。舍此便谈不到中国由中世纪过渡到近代化的阶段上来。要奠定近代科学就必须有与之相配套的思想条件，即近代的思想体系。从培根和笛卡儿的思想方法论到洛克与卢梭的天赋人权论到休谟和亚当·斯密的人性论，在根本上都是与中世纪正宗的经学世界观背道而驰的。当然，没有近代思想也就没有近代科学。而且除非我们把16至19世纪这一段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定位在世界历史的普遍近代化历程这一坐标之上，否则我们将无从正确地评估这一历史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史。须知中国思想文化近代化的历程乃是由19世纪末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一辈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正式揭幕的，而不是西方传教士所发动的、或所鼓舞的。同样地，西方之受到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而蔚然形成为“中国热”并从而深刻影响了西欧启蒙运动的，乃是由于当时莱布尼茨、伏尔泰等一辈先进的科学家和思想家的工作，而非那一小批迂腐的来华传教士。而且从这种意义上说，西方近代化的过程之受惠于中国思想文化者，恐怕不亚于中国思想文化的近代化之借助于西方的思想文化。假如我们的眼光能摆脱徒以炫奇为能事的一孔之见而放眼历史主流开阖的大局，我们或可对这场中西文化交流史的认识更接近于历史的真相。何况过去研究者的重点每每放在西学之东渐而极少着意于中学之西渐，似未免偏颇而有失历史的公正。研究者的着眼点又往往只限于几个并无真正重大历史意义的传教士的身上，则更未免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许先生此书正是能摆脱狭隘的目光而先立乎其大者。此书能放开眼界，高瞻远瞩，立足于世界史的主潮，故能别开生面，发前人之所未发，独树一帜。大抵上可以说，学术领域中凡富开创性的探索，其价值均应属不可磨灭。作者高屋建瓴，独具慧眼，既在阐明中国思想

文化在世界历史近代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又能深入探究在这场文化的交流与冲撞之中，中国如何由先进转化为落后的关键所在；故此本书既能超出一般教科书的描述式的（descriptive）的罗列，又能摆脱人云亦云的流行见解，足以反映我国当今学术在这个领域的高度。

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60年代初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十年来始终孜孜于法国文史与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甚至一词一字之微亦皆深入探索，务期求得其确解而后已，故对时下学术炒作之偷工减料、生搬硬造、欺世盗名之风每每深恶痛绝而不肯假以颜色。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作者于微观探索之后又能以宏观的世界历史观点深入探讨史实背后的深层意义。作者曾译有当代年鉴派代表人物勒华拉杜里（Le Roy Ladurie）的名著《蒙塔尤》（Montaillou），足以反映作者学力之深厚与态度之严谨，尽管这似乎并未迎合时下流行的某些学风。作者在其大作的序言（指前言——编者）中曾提出：

……送上门来的西方基督教文化仅仅吹皱了一池死水，其影响始终没有超出宫廷、高级官僚、知识分子和少数天主教徒的狭小圈子，并未在各个阶层的中国人中间催发稍具规模的“西方热”。

反观欧洲，情形恰好与中国相反。中国并没有派遣传教士前往欧洲传播华夏文明，但是欧洲人对中国的了解和认识，竟然远远超过了中国人对于欧洲的了解和认识。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后，掀起了波澜壮阔的“中国热”，……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这些条件并不是中国人为他们送上门去的，而是欧洲人自己主动创造的。

这一论断可谓笔力千钧直透纸背，实在足以发人深省，可惜许多研究者于此却仿佛皆未曾梦见。谨祝本书的问世可以促进我国学术界在这一领域能有更深入一步的研究和掌握更高一级的视野。

最后想补充的一点小小的意见是：本书的英文目录把“中国热”一词翻译作 Chinese Vogue，我个人以为似未若径用原文“chinoiserie”一词之为传神，质之作者，未审以为然否？

沟通东西的媒介

一、输入欧洲的中国商品

资本主义时代到来之前，由于山海阻隔，交通极为不便，世界尚未形成为一个整体，散居在世界各地的人民，仅与各自的近邻有较多往来，而与相距遥远的地区，基本上处于互不相知的状况。数百年间，仅有屈指可数的几个旅行家曾从欧洲到达亚洲或从亚洲到达欧洲，他们传递着弥足珍贵的信息，增进了相距万里的东西方人民的相互了解。然而，这些信息中虽有旅行家们亲身经历中的大量耳闻目睹，却也掺杂着许多道听途说，乃至似是而非的传闻。凭借这些为数不多而又不甚准确的信息，分处欧亚大陆两端的人民无法真切地了解对方。在欧洲，马可·波罗游记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中国的人和物，令许多人为东方竟然有这样一个文明古国而惊奇。可是，也有不少人觉得难以置信，以为是作者的杜撰。18世纪的一位法国作家就当时欧洲人心目中的中国，说了如下一段话：“我们关于中国的最初知识，来自著名的威尼斯人马可·波罗。他谈到了这个国家的悠久历史，优秀的法

律和政府，肥沃的土地，富足的生活，繁荣的商贸，众多的居民，等等。他描绘了中国人的礼节，他们对艺术和科学的喜爱以及发展艺术和科学的热情。所有这些记述都被视为虚妄的奇谈。人们认为，这种无稽之谈与其说是事实的真实记述，不如说是善意的想象结果。人们觉得，如果相信数千里外有一个强大的国家，它胜过治理得最好的欧洲国家，那简直就是荒谬。什么！在许许多多的野蛮国家那边，在世界的尽头，会有如那位威尼斯人所说的那样一个古老、聪慧和文明的民族？纯粹是痴人说梦，除了头脑简单的人和傻瓜，谁也不会相信。”^①从总体上看，直至16世纪下半叶，对于大多数欧洲人来说，中国依然只是一个抽象乃至虚幻的概念。从另一方面看，中国人对西方的无知更为严重，在许多人的心目中，中国和若干毗邻国家构成了整个“天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绝不仅仅是帝王们的政治观念，也可以说是中国人的地理概念。对于中国人来说，西方是一个十分含混的概念，它既包括南亚的印度、西亚的波斯，也包括欧洲的诸多国家。至于欧洲究竟有哪些国家，几乎没有一个中国人能够说清楚。直到16世纪欧洲人已经来到中国时，中国人不但依然把葡萄牙和西班牙统统称作佛朗机，而且竟然认为“佛朗机近满刺加”，“佛朗机国在爪哇南”，可见当时的中国人对于世界的了解实在少得可怜。从16世纪起，一些欧洲国家为进行资本原始积累，先后开展对外扩张的殖民活动，南美洲、中美洲和亚洲成了它们首选的远征对象。事物往往具有两面性。这些欧洲国家的对外扩张，一方面以其侵略性和掠夺性损害了东方国家的利益，另一方面则在客观上促进了东西方的贸易和交往。就中国而言，除了古代丝绸之路上的商旅之外，与欧洲真正意义上的交往，也是从16世纪欧洲人来到中国以后开始的。

1. 欧人来华

如今我们常说，随着科技进步，世界变得越来越小了，这是说，科技进步令居住在地球上不同角落的人们之间的联系和往来日益方便了，从北京搭乘大型喷气客机，只消十来个小时就可抵达欧洲的任何一个重

^① 鲁斯洛德莱吉：《奇趣轶闻杂录》（Rousselot de Surgy: Mélanges intéressants et curieux），第4卷，巴黎，1766年，第1—2页。

要城市。上溯数百年，那时的地球显得那么大，居住在地球两端的人们根本不具备相互了解、彼此往来的条件，以至于此端的居民丝毫不了解彼端的居民。世界虽然早就存在，而且在不断发展，然而它并不为人们所认识。在历史学家的笔下，近代以前的世界史，基本上是地区史或国别史的拼凑；之所以如此，绝不是因为历史学家们无能，而是由于那时的世界尚未连成一片。

1497年，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Gama, Vasco da, 1469—1524）率领船队离开欧洲，绕过非洲南端好望角，于1498年抵达印度的卡利库特，成为第一个经由海路到达印度的欧洲人，由此开辟了欧洲到亚洲的航路。同样是在1498年，意大利人哥伦布（Colomb, Christophe, 1451—1506）奉西班牙国王之命，第三次横渡大西洋，这次他终于“发现”了美洲大陆。从许多角度来看，16世纪都可视为世界历史的新开端，走出了漫长中世纪的欧洲，开始步入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的新时代。1519年，为西班牙国王服务的葡萄牙人麦哲伦（Magellan, Fernand de, 1480—1521）开始环球航行，1521年到达菲律宾，为土著居民所杀，他所率领的船队中的一艘继续航行，于1522年返抵西班牙，终于完成了环球航行。新航路的发现为欧洲早期殖民活动提供了广阔的前景。最早向东方进行殖民扩张的就是在航海方面走在前面的葡萄牙。葡萄牙于1510年占领印度的果阿，把它变成了东方殖民地的首府，既是葡萄牙远东贸易的重要港口，也是控制远东天主教传教士的据点。英国和荷兰分别于1599年和1602年建立了各自的东印度公司，从17世纪起为向东方扩张而与葡萄牙展开了激烈的争斗，而西班牙此时早已在菲律宾落脚。不久，荷兰的东印度公司从葡萄牙手中夺取了非洲的好望角、印度的马拉巴尔海岸、重要的海上通道马六甲、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和苏门答腊等地。

随着欧洲殖民国家向亚洲和整个东方的扩展，欧、亚两大陆之间的交往与日俱增，彼此隔绝的状态逐渐被打破，世界开始形成一个整体，名实相符的世界历史由此肇始。1514年，葡萄牙商人首次航行到中国南部海面，但未能登陆。1517年，葡萄牙商人佩雷斯·安德拉德（Andrade, Perez）进入珠江，到达广州，随行的官员皮雷斯（Pirez, Thomas）通过贿赂宦官等手段，被允许于1520年北上，抵达南京，翌

年随明武宗进入北京；后因行为不检等原因，遭明朝政府驱赶，两手空空地返回广州。最早到达中国的西班牙人是多明我会教士拉克鲁瓦（La Croix, Gaspard de），他于1556年潜入广东，被发现后遭到逮捕，不久便被驱逐出境。1575年，马尼拉教区主教、西班牙人拉达（Martin de Rada, 1533—1578）及一名随从和两名军官，携带西班牙驻菲律宾总督给中国官员的信件和礼物，来到福建，受到福建巡抚的接见，此后又去过同安、厦门等地。1598年，西班牙驻菲律宾总督派员前往广东，要求通商，他们先到澳门，葡萄牙当局不许进泊，不得已移泊虎跳门，翌年被广东官员驱逐，无功而返。1601年，荷兰殖民者派遣军队进攻马尼拉受挫后，转向澳门，再次受阻，于是企图进入广州，中国官员对他们的来意颇具戒心，仅容许他们作短暂逗留。1603年，荷兰再次派船来华要求互市，又一次遭到拒绝。此后不久，荷兰就开始了占据我国台湾和澎湖的侵略活动，并不断骚扰大陆沿海一带。1622年，荷兰战船围困澳门，遭到反击。明亡清立后，荷兰人于1656年派遣使团到北京朝见顺治皇帝，试图建立正式的通商关系，结果无功而返。1600年，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御准成立东印度公司，由此开始了英国与中国及远东国家的海上贸易。东印度公司不但有自己的商品基地，而且有自己的武装，既能运货，也能海战，它通过设立在马德拉斯和孟买等地的商号，到中国唯一准许进行对外贸易的港口广州采购中国商品。英国东印度公司虽然以采购茶叶和生丝以及瓷器为主，但它允许其员工以个人身份与中国商人做生意，这些私人贸易范围较广，包括织物、服饰、墙纸、漆器、金银和象牙制品等。总起来看，欧洲商人在早期对华贸易中，经常为取得货物而不择手段，名为贸易，实则与海盗行径相去不远。这也正是中国政府限制对外贸易，对东南沿海严加防范的原因之一。

2. 商品西去

中国向来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农业大国，由于疆域辽阔，人口众多，农业和手工业比较发达，在生产水平不高、人们日常生活所需比较简单的条件下，通过国内贸易调剂余缺即可基本满足各地的生产和生活所需，无需大量输入国外产品。明朝建立以后，由于倭寇在沿海一带骚扰等原因，政府实行严厉的海禁，使得本来就不甚发达的对外贸易，遭受

沉重打击。郑和七次远下西洋，固然是世界历史上空前的壮举，而且促进了中国与郑和所到地区和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但是在贸易方面并无巨大收获，仅以中国精湛的工艺品换取了一些香料和珍宝等外国商品，原因之一在于皇帝此举意在宣扬国威，对于贸易方面的收获大小并不十分在意，这与百年以后的葡萄牙和西班牙，为了寻找殖民地和开拓海外市场而扬帆远航，迥然不同。

明清更迭时期的战火，使中国的经济遭到了严重的摧残。康熙皇帝亲政后，一面以军事行动肃清反抗势力，一面采取比较宽松的政策，如蠲免赋税、奖励垦荒以及兴修水利等，鼓励农耕，促进生产发展，使跌入低谷的经济重现生机，再度活跃，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渐渐达到了历史上少见的繁荣。经济的复苏为对外贸易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从总体上看，此时的欧洲尚未建立起资本主义生产体系，英国虽然已完成资产阶级革命，但工业革命却是在18世纪60年代进行的。法国的经济与中世纪并无多大差别，农业和手工业处于相对落后状态，大型手工业工场为数寥寥。尽管缺乏精确的资料，但是我们大致上可以断定，当时中国的农业生产率高于法国，中国有“一人食力可养十人”的记录^①，而法国的国务秘书贝尔旦（Bertin, Henri, 1722—1792）则说：“在中国，耕地的投入与产出在1比15到1比20之间，而法国的一般耕地，这个比率只有1比4.5。”^②由此可见，18世纪的中国虽然仍处在封建社会末期，但就经济特别是农业经济水平而言，依然处于世界先进行列，至少不在当时的欧洲以下，这正是吸引欧洲商人前来中国进行贸易的重要原因。

清朝初年，为了打击南明和明朝遗臣的反清斗争，严厉的海禁一如明朝，顺治皇帝曾下令“不许片帆入口”，致使来华的外商只能在澳门进行贸易。康熙三十二年（1683）平定台湾后，清政府开放海禁，准许外商在广州等四个口岸进行贸易。此后海禁时紧时松，直到雍正五年（1727）才正式废除不准与南洋贸易的禁令，政府在闽、浙、粤等地设关，征收外贸关税。对外开放的局面延续到18世纪50年代。乾隆二十

① 董一山：《清代通史》，第2卷，商务印书馆，1927年，第522页。（《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清宫档案》）

② 法兰西学院（Institut de France）图书馆藏品，ms. 1521。（《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清宫档案》）

二年（1757），清政府断然下令，外国商船只能收泊广州，不得前往其他港口进行贸易，而且几乎所有对外贸易均置于政府的严密控制之下。闭关政策虽然遭到欧洲商人的抵制和反抗，但是，清政府不但毫不妥协，而且更加收缩对外贸易。然而，政府的政策是一个方面，实际情况是另一个方面，中国的对外贸易实际上长期呈现禁而不止的局面。就在明清政府实行严厉海禁之时，中国与周边地区和国家，诸如朝鲜、日本、菲律宾、爪哇，始终保持着频繁贸易往来。通过转口贸易和其他途径，中国的商品特别是丝绸等中国传统的输出品，也能到达欧洲。所以，中国的对外贸易虽然受到政府政策的制约，但依然呈上升趋势。

与中国政府的闭关政策相反，欧洲国家极欲与中国通商，但是它们能够向中国输出的商品不多。作为主要出口品的毛纺织物在中国很难找到买主，钟表等精巧的机械制品虽然受到上层人士的欢迎，但由于不是大众消费品，因而销路极为有限，只有棉花和棉布堪称输入中国的大宗欧洲商品。欧洲产品在中国打不开销路的主要原因，是自然经济下的中国市场容量较小，清朝末年在中国担任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Hart, Sir Robert, 1835—1911）曾说：“中国有世界上最好的粮食——米，最好的饮料——茶，最好的衣着——棉、丝和皮毛。既有这些大宗物产以及无数土制副产品，所以他们不需要从别的地方购买一文钱的东西。”^①此外，欧洲商品在价格和品质上也不具优势，因为，欧洲在实现机器生产之前，与中国相比并无技术优势。相反，自给自足的中国却有不少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为欧洲国家所需，欧洲商人络绎不绝地前来中国东南沿海，低三下四地千方百计求购中国商品，茶叶、生丝、丝织品、瓷器、漆器等都是欧洲各国渴望得到的商品。16世纪初中国瓷器就开始直销欧洲，葡萄牙、荷兰、英国和法国都进口中国的瓷器。英国商船首次航行中国，买回去的货物中就有50余箱瓷器，第一艘来华法国商船昂菲特里特号运回去的也是瓷器，总数多达数万件。据统计，1602—1682年间，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单是荷兰商船运往欧洲的中国瓷器就有1000多万件。^②中国的另一大宗输出品是茶。17世纪中叶荷兰东印度公

^① 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北京，1961年，第4页。

^② 参阅宋培初：《明清陶瓷和世界文化的交流》，北京，1984年。

司开始向欧洲输入中国茶，起初数量极小，1664年转销给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茶仅为2磅2盎司，此后的20年间共进口约6000磅，平均每年输入200余磅。随着欧洲对于茶叶的需求量日益增加，茶叶在中国的输出商品中所占份额逐渐提高，一度成为最重要的输出品，1737年的输出总量高达49000余担。^①

二、东来的欧洲传教士

传教士是随着商人和兵船来到中国的西洋人，他们不仅来了，而且留下来了，不像商人和士兵那样来了又走了。他们中一些人一住就是数十年，从翩翩少年到须发皆白，终老在中国这块好客的土地上。早在1552年，罗马天主教耶稣会元老之一方济各·沙勿略（François-Xavier, Saint, 1506—1552）就来到了珠江口外的上川岛，探索进入中国的可能性和途径。三十余年后，耶稣会士不仅终于进入中国，而且到了北京，在以后的漫长岁月里，他们和其他修会的传教士一起，为了上帝的事业而长期居留在中国，成为对中国最了解、最熟悉的西洋人。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欧洲商人和传教士来华，就不会有欧洲的“中国热”。

1. 基督教与中国的早期接触

明朝天启五年（1625）在西安附近出土了一块石碑，高近一丈，宽约四尺，顶端为金字塔形，并铸有十字，下书“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文共约二千字。此碑的发现，揭示了基督教早期在华传播的一段历史。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elliot, Paul, 1878—1945）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在敦煌发现若干景教文献，日本学者也收藏了一些发现于敦煌的景教文献。所谓景教，是指基督教的聂思托里派，这个教派为出生于叙利亚的聂思托里创于公元5世纪，主张神与基督是两位两性，而不是一位两性，被罗马天主教教会斥为异端，禁止传播。聂思托里于是转向中亚一带发展。根据“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和上述文献记载，景教于

^① 参阅萧致治、徐方平：《中英通使前的茶叶贸易》，载张芝联主编：《中英通使二百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1996年。

公元635年（唐太宗贞观九年）传入中国。那年有一个名叫阿罗本（Alopen）的教徒从波斯或叙利亚来到西安，唐太宗派遣宰相房玄龄前往迎接，并亲自在皇宫接见，询问有关该教的一些情况。三年之后，唐太宗下诏，准许在中国随意传教，并在西安附近建造一所寺院，供景教徒使用。唐高宗继续执行准教政策，并封阿罗本为“镇国大法师”，下令天下各州普遍建立景教寺，于是出现了“法流十道，寺满百城”的繁荣景象，教徒逾千。阿罗本等西来的基督教徒在中国站稳脚跟后，立即着手翻译基督教经典。现有资料表明，基督教景教中的主要内容，诸如天主自有、三位一体、上帝创造宇宙和人类等，都已介绍给中国人。武则天佞佛，景教在她执政期间受到打击，但唐玄宗即位后景教再度复苏，这位皇帝竟让他的五位兄弟去景教寺参拜，还下令将唐朝五位皇帝的画像悬挂在景教寺中。唐武宗会昌五年（845），皇帝严禁佛教，令天下僧尼一律还俗，声势之猛，殃及其他宗教，景教寺被毁，神职人员被勒令还俗，景教从此一蹶不振，仅有极少数教徒留存。

13世纪，蒙古人大举西进，欧洲为之震惊。教皇因诺森四世（Innocentius IV，1243—1254在位）在法国里昂召集欧洲各国主教，共商对策。会后派遣意大利教士柏朗嘉宾（Piano Carpini, Giovanni, 约1182—1252）往见蒙古大汗，一则探听虚实，二则力争劝说大汗皈依基督教，从而消弭蒙古人西进的威胁。1245年，他带着教皇致大汗的信件从里昂出发，于翌年到达蒙古大汗的都城哈拉和林，适逢贵由继位为汗，他参加了继位大典，后来又晋见贵由，递交了教皇的信件。同年年底，柏朗嘉宾带着大汗的回信踏上归途，1247年回到当时教廷所在地法国南部的阿维尼翁。1253年，法国国王路易九世选派法国方济各会士卢布鲁克（Rubrouck, Guillaume, 约1215—1270）携带国王信件从地中海东岸出发，往见蒙古大汗。与柏朗嘉宾不同，卢布鲁克不承认自己是使臣，而仅是一个传教士。他抵达蒙古汗廷后曾要求留下传教，1254年在哈拉和林两度会见大汗蒙哥，同年8月带着蒙哥给路易九世的回信返回地中海东岸。遵照方济各会的要求，卢布鲁克书写了出使报告，连同蒙哥的回信一并转呈路易九世。哈拉和林如今在蒙古国境内。虽然贵由和蒙哥分别会见柏朗嘉宾和卢布鲁克时，蒙古人尚未入主中原，但由于贵由和蒙哥后来分别被谥为元定宗和元宪宗，所以称这两位欧洲教士的东行是基

基督教与中国的接触是完全有理由的。基督教在元朝被称作也里可温教，其中包括聂思托里派和天主教，一度也曾有过它的辉煌时期，汗八里（北京）、扬州、泉州等地都曾建起了也里可温教的寺院，教徒总数多达3万余人。这一成就的主要缔造者是意大利传教士孟高维诺（Montecorvino, Giovanni da, 1247—1330）。1289年，孟高维诺带着教皇尼古拉四世（Nicolas IV, 1288—1292在位）的信件，经印度到达中国，1294年抵大都，翌年晋见元成宗，呈交教皇信函，获准留在大都传教。到1305年教徒已有6000人，其中多数是蒙古人和随蒙古人进入中原的中亚各族人，汉人教徒极少。1307年，教皇获悉孟高维诺传教成绩显著，遂设立汗八里总教区，委任孟高维诺为大主教，并陆续派遣教士前来支援，其中到达中国者三人，其余均死于来华途中。此三人除留在大都协助孟高维诺外，还南下主持泉州的教务活动。孟高维诺于1330年去世后，教廷于1333年派遣鲍特拉（Botras, Jean de）率领二十六名教士前来中国，四年后抵达汗八里。元顺帝于1336年应教徒之请，派遣在华的一位法国方济各会士为代表，带领十余名中国教徒，前往当时教廷所在地法国的阿维尼翁向教皇陈情，要求续派主教来华。代表团带去了元顺帝的国书，证明这些代表具有使节资格。教皇热情地接待了远道而来的中国代表团。鲍特拉使团的成员之一马黎诺里（Marignolli, Giovanni）于1342年抵达汗八里，向中国皇帝献上良马一匹，获得皇帝和官员的好感。1346年，马黎诺里经由杭州、宁波、泉州扬帆西返。元朝的基督教虽然拥有众多教徒，但大多不是汉人，加上孟高维诺去世后无人继续他的事业，因而明朝取代元朝之后，基督教便骤然衰落。

2. 利玛窦开创在华传教事业

基督教在中国沉寂了近二百年后，于明末清初再度复兴。无论从纯宗教角度或是中西交往角度看，唐代的景教以及元代的也里可温教都无法与明清之际的天主教相比，它不仅在当时形成巨大的声势，而且对后来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新航路的发现不但为殖民国家向外开拓提供了条件，也刺激了天主教东来的热情。葡萄牙和西班牙既是当时的海上强国，又是坚决反对宗教改革的天主教国家，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的结合，使得这两个国家向

东扩张特别积极。正在此时，西班牙人罗耀拉（Loyola, Inigo Lopez de, 约 1491—1556）于 1528 年创立耶稣会，强调绝对忠于罗马教皇，并以积极向外传播基督教为己任，1540 年教皇颁谕批准耶稣会成立。同年，罗耀拉指定方济各·沙勿略前往东方开展传教活动。1541 年，方济各·沙勿略离开葡萄牙，先后到过印度、斯里兰卡、新加坡，后来在日本居住了两年。在这些年中，他深切体会到中国文化在亚洲的巨大影响，深知若要让天主教在远东扎根，必须首先了解中国，于是决心先去中国传教。1552 年 4 月，方济各·沙勿略从印度的果阿出发，来到广州湾外面的上川岛，由于中国海禁严厉，未能登上中国大陆，同年年底病死在该岛上。

进入中国的第一个耶稣会士是罗明坚（Ruggieri, Michele, 1543—1607），他奉耶稣会印度省巡视员范礼安（Valignano, Alessandro, 1539—1606）之命到中国传教，1579 年到达澳门，在那里悉心学习中文，为进入中国内地作准备，1579 年至 1582 年间他曾三次前去广州。直到 1583 年才终于获得进入中国内地的许可，在肇庆落脚。由于罗明坚没有语言障碍，加之学识渊博、谈吐文雅，因而博得当地官员的尊敬，被允许建立传教场所。从此，欧洲传教士终于在中国内地有了传播福音的基地。

紧随罗明坚而来的是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Ricci, Matteo, 1552—1610），他于 1583 年与罗明坚一同进入中国内地，两人共事将近十年。在这段时间里，他学习并掌握了汉语口语和文言文以及其他许多有关中国的基础知识，为他此后的活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利玛窦和罗明坚初到中国之时，出于对中国社会状况的无知，以为基督教的传教士类同佛教的和尚；为了便于接近中国民众，遂削发剃须，身披袈裟，以僧人面目出现，结果却是疏远了文人。直到 1594 年，利玛窦才听从友人瞿太素的劝告，蓄发留须，改着儒服，自称“西儒”，这才渐渐扩大并加深了与文人的来往，进而建立了友谊。1595 年，利玛窦游历南京，试图北上进京未果，南归居留在江西南昌。1598 年，他终于进入北京，但没有获得长久居留的许可，只得返回南京。1601 年，利玛窦第二次进京，终于获准长期居留。

利玛窦在罗明坚的带领下，开始了天主教在华的传教事业。罗明坚

于1588年返回欧洲后，利玛窦与庞迪我（Pantoja, Diego de, 1571—1618）等人继续努力，终于为天主教在华传教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严格地说，利玛窦在中国仅仅博得了巨大的名声，却并未在传教中取得惊人的成就，听了他的宣传而皈依基督教的中国人并不多。他的贡献主要有二：一是确立了耶稣会在华传教策略，为后来者指明了通向成功的途径；二是为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利玛窦把自己获得巨大名声归之于五个原因：一是能相当正确地说和写汉语；二是有惊人的记忆力，能背诵《四书》；三是有数学知识；四是有钟表、三棱镜等西方奇物，可以示人或馈赠；最后一个原因才是他所传播的基督教教义。^①我们认为，他所以能够取得出色的成就，除了他个人的学识和才能外，主要得益于他从实践中摸索出来的行之有效的做法。第一，利玛窦基于对中国国情的了解，深知绝对不能搬用基督教在南美洲等地使用的方法，而必须在尊重中国古老文明的前提下，采取适应中国文化思想的传教方法。为此他主张通过对儒家思想的附和、补充和超越，在避免与儒家思想发生正面冲突的条件下宣传基督教教义，使他的传教对象不但不觉得基督教与中国的传统思想有太多的相悖之处，而且还有所补充和发展，因而乐于接受基督教教义。第二，利玛窦摒弃急功近利的做法，采取迂回曲折、徐图缓进乃至欲擒故纵的策略。为了避免引起中国文人的反感，他甚至将传教意图完全遮掩起来，与他的传教对象热烈讨论中国经典，闭口不谈基督教，待双方建立信任后，方在适当时机提出皈依问题。第三，为了激发中国士大夫对西方和基督教的好感，利玛窦充分展示他所掌握的科学技术知识和技能，并介绍西方在科学技术上取得的成就，一则用以表明欧洲并不比中国落后，欧洲人完全有资格同中国文人探讨学问，再则用以破除士大夫中习见的闭塞保守乃至夜郎自大的心理，使他们乐于接受西方的学问，为接受基督教教义并最终皈依基督教创造条件。第四，鉴于中国是一个有数千年历史的专制集权国家，利玛窦十分明白“擒贼先擒王”这个道理，始终把文人和官宦等精英和上层人物视为传教的重点对象，并把争取皇

^① 参阅谢和耐：《中国与基督教》（Gernet, Jacques: *Chine et Christianisme, Action et Réaction*），巴黎，1982年，第29页。

帝皈依基督教作为在华传教的最高目标。作为传教士，利玛窦在华的业绩也许谈不上辉煌，因为接受他洗礼而皈依天主教的中国人并不多，但是他在华争得了许多同情者，为欧洲传教士在中国创造了受人喜爱的形象和良好的基础。

利玛窦的学术传教策略为欧洲与中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提供了新的机遇。对于利玛窦来说，传播基督教福音是目的，进行学术交流是手段，前者为主，后者为次。然而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主次关系恰好颠倒过来，他们接近传教士乃至在某种程度上接受基督教教义，主要原因是希望借此获得西方的科学知识，基督教教义对他们来说基本上是格格不入的。继利玛窦而来的欧洲传教士，凡是继续执行他的传教策略的，都受到中国人的欢迎；他们在为皇帝和宫廷提供各种服务的同时，既传播了基督教，又推动了中国与欧洲之间的文化交流。

3. 法国耶稣会士为在华传教事业注入新的活力

明末清初基督教东来初期，在华法国籍的传教士人数远在葡萄牙籍和意大利籍的传教士以下，但从17世纪80年代起，随着法国国力增长和海外事业的发展，这种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在此后近百年中，在华法国传教士不仅人数大增，在全部在华欧洲传教士中所占比例甚大，而且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非其他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的传教士所能匹敌。

继利玛窦之后来华的传教士，一面要为皇帝和宫廷服务，一面要传播天主教，深感人手不敷所需，迫切希望更多的欧洲传教士来华工作。1678年5月，已在清廷钦天监任职的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Verbiest, Ferdinand, 1623—1688）写信给全欧洲的耶稣会士，呼吁增派传教士来华。这封信引起了欧洲教会人士的广泛注意。法国财政总监柯尔伯（Colbert, Jean-Baptiste, 1619—1683）接受巴黎天文台台长卡西尼（Cassini, Jean-Dominique, 1625—1712）的建议，此时正准备派人前往东方进行科学考察。鉴于耶稣会士普遍具有广博的学识，是既可传教又能进行科学考察的最佳人选，他便建议派遣耶稣会士前往东方。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极欲扩大法国在海外的影响，增进与远东的贸易，因而对柯尔伯的计划给予大力支持。经卡西尼与耶稣会磋商，一个六人名单很快

就确定下来，他们是洪若翰 (Fontaney, Jean de, 1643—1710)、白晋 (Bouvet, Joachim, 1656—1730)、张诚 (Gerbillon, Jean-François, 1654—1707)、刘应 (Visdelou, Claude de, 1656—1737)、李明 (Lecomte, Louis-Daniel, 1655—1728) 和塔夏尔 (Tachard, Guy)。由于法国当时尚无直航中国的商船，而法国人又不愿意借道里斯本搭乘葡萄牙船只，被选中的六名耶稣会士因而迟迟不能成行。1683年柯尔伯去世，派遣计划遂被搁置。1684年，比利时籍传教士柏应理 (Couplet, Philippe, 1624—1693) 自中国返回欧洲，在巴黎逗留期间拜谒凡尔赛宫，向路易十四当面陈述了派遣传教士去中国的种种好处。在路易十四的亲自过问下，这项搁置了数年的计划终于付诸实施。1685年3月洪若翰等六人从法国的布勒斯特港扬帆起航，前往中国，塔夏尔中途滞留暹罗，其余五人则于1687年7月抵达宁波。

法国耶稣会士与先他们而来华的其他各国传教士至少有两点不同。第一，其他传教士几乎无一例外地受教会派遣而来，法国耶稣会士却是法国国王派来中国的。第二，其他传教士来华的唯一任务就是传播上帝的福音，法国耶稣会士则除了传教外，明确地肩负着科学研究任务，临行之前，法国国王还特地授予他们“国王的数学家”头衔。法国耶稣会士的这两个特点，使他们在所有在华传教士中间，成为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他们有很强的为本国利益服务的愿望，与本国的政府、教会、学术团体和学者的联系比较密切，著述比较多。利玛窦开创的学术传教传统虽然在耶稣会士中间得到继承，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仅仅把包括为皇帝和宫廷提供技术服务在内的各种与文化交流有关的活动，当作取悦皇帝、结交中国士大夫，进而在中国站稳脚跟的手段。法国耶稣会士则不同，对于他们来说，科学活动既是传教的手段，也是他们来华的任务之一，而且就为他们的祖国服务而言，进行科学活动的重要性甚至可以说大于传教本身。因此，他们无论在向中国人传播西方科学知识方面，还是在了解和研究并向西方介绍中国方面，都较其他传教士具有更高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这些特点显现在首批来华的五位法国耶稣会士身上，同样体现在此后陆续来华的众多法国耶稣会士身上。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法国耶稣会士在18世纪的中国与欧洲的文化交流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对于欧洲的“中国热”，他们同样起了催化作

用，因为许多欧洲人，其中包括许多著名的思想家、学者和知识分子，都是在读了他们的有关中国的著述以后，才对中国发生兴趣，进而研究中国的。

三、旅欧中国人

1. 17、18 世纪到过欧洲的中国人

明清之际，中国政府长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不但严格限制外国商人来华贸易，而且不准国人出洋。但是，闽粤江浙一带，仍有许多从事对外贸易的商人和船民，往来于南洋各地；更有大批贫民为生计所迫，背井离乡流落到外国去做苦工。然而，由于路途遥远和交通条件的限制，19 世纪之前到过欧洲的中国人寥寥无几。这些人主要是作为助理、随从或翻译陪同洋教士前往欧洲办理教务的中国教徒，他们通常在欧洲逗留的时间较短，完成任务后立即随同洋教士返回中国。为数不多的几个年轻教徒被洋教士遴选为高级神职人员的培养对象，被派往欧洲进入神学院接受正规教育，完成学业、取得神职后返回中国。培养一名高级神职人员需要多年，而这些中国学生更需首先学习语言，所以他们在欧洲逗留的时间很长。大多数中国学生完成学业后立即返国，只有极个别赴欧的中国教徒由于始料不及的原因定居欧洲，客死异乡。在当时中国与欧洲彼此阻隔、相互了解甚少的条件下，这些到过欧洲的中国人，无论长住或短留，无论有心或无意，都为欧洲带去了有关中国的信息，从而为增进欧洲对中国的真切了解和认识作出了贡献。

波兰籍耶稣会士卜弥格 (Boym, Michael-Pierre, 1612—1659) 来到中国后，先后到过海南、四川、云南等地，回到澳门不久，就到广西为南明政权的永历皇帝服务。永历皇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十分特殊的朝廷，包括皇太后在内的许多皇室成员都正式受洗皈依天主教，皇帝本人虽然不是教徒，但积极支持皇室成员入教。通过教会的关系，澳门的葡萄牙当局曾经拨调兵员和大炮支援永历与清兵作战。1649 年，永历朝廷迭遭挫败，桂林失陷，广州等地也危在旦夕，走投无路之际决定派人向罗马教廷求救。卜弥格被选定为使臣，带着皈依天主教的皇太后和重臣庞天寿分别致教皇和耶稣会总会会长的信函，前往罗马。庞天寿为了以后续派使团去欧洲天主教国家时，既不失中华风范，又符合这些国家的礼

仪和习俗，决定派员与卜弥格同行，进行实地考察。被选中的是一位年仅19岁的官员陈安德（西文写作 Cheng An-te-lo，又作 André Tcheng）。卜弥格一行在罗马与德籍耶稣会士基尔歇（Kircher, Athanasius, 1602—1680）相遇，交流了有关中国的信息。应基尔歇的要求，卜与陈依据顺治元年（1644）李之藻等人刻印的本子，将1625年在西安附近发现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从中文直接译成拉丁文，刊布在基尔歇主编的《中国图说》中。此外，在基尔歇出版于1652年的另一部著作中，还刊出了陈安德书写的两篇中文文件。^①卜弥格一行完成使命后，于1656年带着教皇亚历山大七世（Alexandre VII, 1655—1667年在位）给永历皇帝的复信返回中国，途中历经艰险，抵达澳门时因葡萄牙当局拒绝入境而转赴安南，取道陆路进入中国。但他未能再次踏上中国的土地，1659年病死在安南，随同他返华的陈安德将他埋葬后，独自返回中国。在有文字资料可查的赴欧中国人中，陈安德应是最早的一位。

在不少有关著述中，郑玛诺被说成是赴欧的第一位中国人，称他是随同耶稣会传教士卫匡国（Martini, Martino, 1614—1661）前往罗马的那位中国教徒。其实，郑玛诺和卫匡国的随从不是同一个人，而是两个人。他们有许多共同之处，这大概是误将两人当作同一个人的主要原因：两人都是年轻的中国教徒，目的地都是罗马，离开中国的时间只差两三年；另一个原因则可能是郑玛诺后来不但回到中国，而且还担任过神职，这些都有文字记载可查；而卫匡国虽然再度来华并终老在杭州，但是他的那位随从却不知所终，于是人们便想当然地把郑玛诺说成是卫匡国的随从了。郑玛诺本名郑维信，原籍广东，1633年（明崇祯六年）出生在澳门，年幼时即受洗入教，教名 Emmanuel，汉译为玛诺，西人则称他为 Emmanuel de Siqueira。1645年，12岁的郑玛诺远离故土，随法国神甫罗历山（Rhodes, Alexandre de, 1593—1660）去意大利接受天主教会的正规教育，1649年到达罗马，1651年入初修学院学习意大利语和拉丁语，1653年入罗马公学研习神学、数学、哲学、修辞等课程。他在学习期间加入耶稣会，成为中国第一位耶稣会士。学习结束后赴里

^① 参阅艾丹妮：《尼古拉·弗雷莱（1688—1749），一位18世纪人文学者对中国的思考》（Elisette-Poiale, Danielle: Nicolas Fréret (1688—1749), Réflexions d'un humaniste du XVIII^e siècle sur la Chine），巴黎，1979年，第247页。